



世纪文库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学研究十八篇/梁启超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5325-5142-2

I. 佛… II. 梁…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49 号

责任编辑 郑明宝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5

插 页 4

字 数 356,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5142-2/B·653

定 价 3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劭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佛学研究十八篇

前 言

清末民初，在社会改革思潮的冲击下，积弱已久的中国佛教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景象。杨文会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创始者，先后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前者广搜佛经，刻印流通，后者办学授课，培育佛教人才，一代佛教义学之风由此而得以开启。

自此以后，佛教团体和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上海佛教居士林（后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中国佛教会等相继诞生；佛学院和佛学研究会，如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会、闽南佛学院、三时学会、汉藏教理院等陆续成立；佛教出版机构，如上海佛学书局、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重庆刻经处等纷纷涌现；佛教刊物，如《佛学丛报》、《佛教月报》、《佛学半月刊》、《海潮音》、《内学》等不断问世；《大藏经》、佛教辞典、佛教经律论，以及佛教注疏、论著、史传，如《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铅印本）、《续藏经》（影印本）、《佛学大辞典》、《法相辞典》等源源刊行；佛教各宗，如华严、天台、法相、净土、律、禅、密宗均受到弘扬；中外佛教，如中国与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种，如日文、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的汉译工作积极开展；作为佛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如施医、施

食、施衣、救济贫困、造桥、修路、种树等广泛进行，凡此种种，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梁启超说：“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佛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对这一现象作了概括。

虽说其间也曾屡次发生过社会上的一些激进分子，以“庙产兴学”为名，企图侵夺寺产的事件，佛教内部围绕太虚提出的僧制改革，形成过对立的两派，但这毕竟是佛教复兴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小插曲，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佛教复兴，在多种力量的混合作用下，稳步地得到推升。此间，不仅涌现了一批有名望德行的佛教僧人、居士，也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专治或兼治佛学的佛教学者，梁启超就是兼治佛学类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

梁启超是在其师康有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佛教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盛赞“佛学之博大精深”，认为“大同（大同世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癸部《去苦界至极乐》）。梁启超评论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南海康先生传》）又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三十自述》）表明他的佛教因缘，始于老师康有为。

梁启超又是在与同道好友谭嗣同的交往中，切磋佛学，加深研究的。谭嗣同初学今文经学，甲午战争后，为救国图存，转向新学（即“西学”）。1896年，谭北游访学，在北京与梁启超结识，全面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同年夏天，谭到达南京，从杨文会研习佛学，历时近一年。谭的代表作《仁学》就是住在杨文会的寓所里写的。在《仁学》

中，谭嗣同提出：“佛教大矣，孔（指儒教）次大，耶（指耶稣教）为小”，“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如同梁启超所说的，谭嗣同“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在南京时，梁启超正在上海办《时务报》，谭嗣同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就《仁学》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佛学问题），与梁启超“迭相商榷”（见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启超早年推尊佛教的“三界唯心”说，认为“豪杰之士”之所以没有“大惊”、“大喜”、“大苦”、“大乐”、“大忧”、“大惧”，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了“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见《自由书》）。晚年，他笃信佛教的“无我”说和善恶报应说。他说，“无我”就是他的“信仰”，他之所以“常觉快乐”，悲愁不足以扰乱他的意志，“此即信仰之光明所照”（《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又说，善恶报应是“宇宙间唯一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给孩子们书》）。1921年，他到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曾到金陵刻经处，从欧阳渐（字竟无）学习唯识学，前后二十天，虽病不辍。他赞叹说：“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方知有真佛学。”（《致蹇季常书》）1922年，欧阳渐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梁启超与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支那内学院校勘出版的《玄奘传》，在玄奘西行求法的具体年代上，采用的就是梁启超的“贞观元年”说，支那内学院有关《大乘起信论》、《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以及其他一些经论的辨伪，也受之于梁启超的影响和日本学者研究的启发。与居士系统创办的佛学院保持密切交往的同时，梁启超与僧人系统创办的佛学院也交谊深厚。1922年，太虚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梁启超曾被推举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梁启超说：“我喜欢研究佛教”（《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愿夙好治佛学史”（《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此，他经常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著文或演讲的方式，传播于世。由于

梁启超是当时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学问和文章名满天下，故他的佛学文章如同其他文章一样，一经问世，便备受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梁启超一生发表三十多篇佛学文章，它们分别刊载在《地学研究》、《改造》、《哲学》、《东方》、《清华周刊》、《图书馆学季刊》等刊物上。另外，还有若干篇手稿，如《说〈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今读》等，未曾刊行（见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所发表的佛学文章，经历了两次編集。

一次，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編集出版的《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此辑分为上、中、下卷，其中，中卷收录了梁启超于1922年10月亲自选定的佛学文章十二篇（附录一篇）。梁启超在为该辑所作的“叙”中说：“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所辑的十二篇是：

(1) 《佛教之初输入》（附：《〈牟子理惑论〉辨伪》，作于1920年）

(2) 《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作于1920年）

(3) 《翻译文学与佛典》（作于1920年）

(4) 《佛教与西域》（作于1920年）

(5) 《佛典之翻译》（初撰于1920年，改定于1922年）

(6)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作于1920年）

(7) 《说〈四阿含〉》（作于1920年）

(8) 《说〈六足〉、〈发智〉》（作于1920年）

(9) 《说〈大毗婆沙〉》（作于1920年）

前言

(10) 《读〈修行道地经〉》(作于 1920 年)

(11) 《〈那先比丘经〉书》(此辑目录中作《〈那先比丘经〉书后》，但正文的标题则无“后”字，疑是脱漏所致。作于 1920 年)

(12)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作于 1922 年)

上述文章均作于 1920 年至 1922 年之间。此为商务印书馆版的梁启超佛学专集。以集中收录的佛学十二篇为底本刊行的单行本名为《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另一次，是上海中华书局于 1932 年编辑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合集》分为《文集》和《专集》两类，其中，《专集》第十四、十五册，收录了梁启超的佛学文章十八篇(附录十篇)。1936 年，中华书局又将这些文章从《专集》中抽出，编为单行本刊行，这便是《佛学研究十八篇》。此为中华书局版的梁启超佛学专集。

中华书局版的《佛学研究十八篇》，与商务印书馆的《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相比，正文新增了七篇：

- (1)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作于 1920 年)
- (2) 《印度佛教概观》(作于 1920 年)
- (3)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作于 1925 年)
- (4) 《又佛教与西域》(作于 1920 年)
- (5)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作于 1920 年)
- (6)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作于 1925 年)
- (7) 《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作于 1922 年)

附录新增了八篇：

- (1) 《佛教大事表》(作于 1920 年)
- (2) 《汉明求法说辨伪》(作于 1920 年)
- (3) 《〈四十二章经〉辨伪》(作于 1920 年)
- (4) 《说无我》(作于 1925 年)
- (5) 《佛教典籍谱录考》(作于 1920 年)
- (6) 《佛教心理学浅测》(作于 1922 年)

(7)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作于1924年)

(8)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作于1924年)

在两版同收的一些文章中，其编次与篇名也略有改动。如《〈大乘起信论考证〉序》，在商务印书馆版中为正篇，而在中华书局版中则改为附录；商务印书馆版中的《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在1921年9月15日《改造》第4卷第1号刊出时，已易名为《中国印度之交通》，故中华书局版也采用后名。这样，中华书局版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就将所收文章的截止年代，从1922年延长至1925年，使之成为梁启超晚年佛学代表作的汇编。

(三)

《佛学研究十八篇》，粗看起来，是一部论文集，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的主体乃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佛教史》的未定稿，以及为撰书而作的相关研究(如经论、史传的研究)的心得。

笔者的这一说法有何证据？请看梁启超的自述：

《佛典之翻译》前言说：

“本篇是民国九年春夏间所作《中国佛教史》之第五章。近两年来继续研究之结果，对于原作大不满意，正思得数月余力，全部改作，本篇为当时用力最勤者，不忍抛弃，故采以入此。其中见解与现时所见悬殊者仍甚多，材料亦多缺漏，组织亦未完备，存之以备与他日新著相较云尔。”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说：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

“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具详第四、第五章两章。建设事业，则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

《印度佛教概观》说：

“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述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教与西域》说：

“中印交通，以西域为媒介。故必先明此三地相互之关系，然后佛教输入之本末可得言也。……读《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笔者注：指《印度佛教概观》第一节），当已知迦腻色迦王与印度佛教之关系。”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说：

“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故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

“如本篇第一章（笔者注：指《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

《翻译文学与佛典》说：

“现在藏中佛经，号称最初译出者，为《四十二章经》，然此经纯为晋人伪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

“《大乘起信论》，旧题真谛译。近来学界发生疑问，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

“吾并不主张‘大乘非佛说’，不过承认大乘经典晚出耳。其详见拙著《中国佛教史》。”

根据梁启超的以上自述，并参校《佛学研究十八篇》的其他内容，不难推出以下的结论：

梁启超曾于1920年春夏撰《中国佛教史》。初稿分为两篇六章。第一篇是讲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的，因为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本源，西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媒介和途径。下分二章：《印度佛教概观》（其扩展性研究，构成《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异部宗轮论述记〉》、《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等文）和《佛教与西域》（其扩展性研究，构成《又佛教与西域》）。第二篇是讲中国佛教的，内容包括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下分四章：《佛教之初输入》（此文曾发表在1921年8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2号上，梁启超自注：“此为拙著《中国佛教史》第二篇第一章。”其扩展性研究，构成《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一文，梁启超后以此取代《佛教之初输入》，作为第二篇第一章）、《中国印度之交通》、《佛典之翻译》（其扩展性研究，构成《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诸宗之成立》（未成，后改为《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其扩展性研究，构成《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文中说的第四、五、六章，都是按第一篇二章的顺序排下来说的，实是第二篇的二、三、四章。

前言

由于佛教史牵涉的方方面面极广，这不是花几个月的时间，就能研究透的。故随着研究的深入，梁启超对原作大不满意，想全部改作，又苦于没有时间，最后便决定以论文集，而不是以专著的方式刊行。这就造成了《佛学研究十八篇》形式上是论文集，其实质是《中国佛教史》的未定稿及其衍生产品的情由。

（四）

《佛学研究十八篇》的特点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内容叙及：佛教的产生，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五蕴、十二因缘、业、轮回、无常、无我、涅槃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护法事迹，印度境内佛教宗派的分布情况，中印之间的交通，佛教东渐的路线，西域来华的译僧，西行求法的古德，佛教输入中国的年代和地点，汉明求法说、《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传说和经典的辨伪，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佛经翻译的演进（包括译场的组织、翻译理论的提出、翻译文体的改进，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佛教经录的地位，汉唐高僧的著述，玄奘的行历年谱，《四阿含》、《大毗婆沙》、《异部宗轮论述记》等经典的梗概，等等。其中，有不少见解与论述，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论，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

如关于佛经的成立。梁启超提出“四个观念”：一、佛经并不是佛在世时就有的，无论是哪一乘（大乘或小乘）哪一派所传的佛经，都是佛入灭以后佛弟子追述而成的。其中，最初编成的，在佛灭数月之间，最晚编成的，在佛灭五百年以后。二、佛经的追述，有团体公开结集和个人私著两种方式，前者有确切的时间可考，后者则无从确考。三、佛经的流通，分为单行本和丛书两种形式，现存的十多部大经（指《阿含经》、《般若经》、《宝积经》、《大集经》、《华严经》、《法华

经》、《涅槃经》等），均是丛书。而这种丛书，有的是在确定的时间内编纂而成的，有的是经历若干年的增补附益才告完成的。四、佛经最初皆无写本，全靠记诵而得以流传。写本大约产生于佛灭数百年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逐渐写录成各国文字。简略地说，佛经都是翻译文学（见《说〈四阿含〉》）。

关于研究《阿含经》的必要性。梁启超认为，我国自隋唐以后，学佛者以谈小乘为耻，《阿含经》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已有一千年了。但是，“真欲治佛学者，宜有事于《阿含》”，也就是说，真正想研究佛学的，应当从《阿含经》入手。其原因有六：第一，《阿含经》是最早形成的经典，采用公开结集的形式产生，最为可信。虽然不能说佛的教说（“佛说”）已经全部收集于《阿含经》之中，但《阿含经》作为佛的教说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佛经的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阿含经》虽然也不免有文学的成分，但与其他晚出的佛经相比，比较少，比较接近于朴实说理的性质。因此，虽然不能说《阿含经》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佛语，但它所含的佛语的分量多而且纯，则是其他佛经所不能及的。第三，《阿含经》的体裁实际上是言行录，与《论语》的性质大致相同，要想体验佛的现实的人格，舍此没有别的途径可寻。第四，佛教的根本教理，如四谛、十二因缘、五蕴皆空、业感轮回、四念处、八正道等，在《阿含经》中均有详细的说明，假如连这些概念也弄不明白，那么，读大乘的经论，更无从索解。第五，《阿含经》非但与大乘经不相冲突，而且它本身就蕴含了不少大乘教义，不能因为它偏于小乘，而轻率地加以唾弃。第六，《阿含经》叙及当时社会的事情最多，读后可以了知佛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应机施化的良苦用心。异国异时代的人，怎样才能受用佛学，于中可以受启自觉（见《说〈四阿含〉》）。

关于西行求法的路线。梁启超综合佛教史传上的记载，归纳为六条：一、“海路”。从广州、安南、青岛等地出发，乘船渡海，经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师子（今斯里兰卡）等国，抵达印度。二、“西